

皮肤病学专家 医学真菌学专家 廖万清

(1938.11~)

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士家乡：梅县桃尧黄沙村



驰骋医学真菌领域的将军

——访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廖万清院士

白蕊

廖万清简介

1938年生于新加坡，1941年回国，祖籍广东梅县桃尧镇黄沙村。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职特一级将军、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皮肤病学专家、医学真菌学专家。1961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后进入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皮肤科工作。1985年创立了中国医学真菌保藏管理中心隐球菌专业实验室，明显提高了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治愈率；发现6种新的病原真菌及新的疾病类型；对军队真菌病防治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曾担任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分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菌物学会理事兼医学真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真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微生物与感染杂志常务编委、中华皮肤科杂志、临床皮肤科杂志、中国皮肤性病杂志编委等十八项学术兼职。1990年获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及政府特殊津贴，荣获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荣誉称号，1992年荣获上海市“爱国奉献先进个人”荣誉称号，1996年荣获上海市“侨界十杰”荣誉称号，上海市第九届政协委员，2002年荣获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以第一完成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三等及省部级各类成果奖18项；主编《真菌病学》、《病原真菌生物学研究与应用》等专著8部，其中《真菌病学》获中国图书奖二等奖；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200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一代名师”称号。

他有着多重身份：将军、院士、归侨，可他说自己归根结底是名医生；他幼年远离父母回到国内，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为此他立志报效祖国（参军、从医）；工作中，他不为权威所束缚，最终发现了新菌种；他说院士就是战士，继续着他的“战斗”。

生于新加坡，长于新中国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灾荒迫使广东梅县一对客家夫妇踏上迁徙之路，到南洋谋生。他们先是漂洋过海到达印度尼西亚，靠经营一家小车衣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1938年，当这对夫妇又漂泊到新加坡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这个小男孩就是廖万清。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到了东南亚，当地居民的生命岌岌可危，在前途未卜、生死未知的情况下，廖万清的父母决定把三个孩子中的一个廖万清送回中国，留根于祖国。那年廖万清才3岁，就被送回了广东梅县桃尧黄沙村，开始远离父母、与叔叔相依为命的生活。廖万清叔叔家住在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四周青山的主峰上有棋盘石、笠麻栋等王寿山十八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蜿蜒流过廖家祠堂和廖万清上学的明新小学堂。

关于棋盘石、笠麻栋有着这样的民间传说：王寿山风光秀丽，常有仙人云游至此。有一回，两位仙人在棋盘石对弈，一位仙人觉得热，便把斗笠随手扔了出去，形成了笠麻栋。这是廖万清小时候最早接触的“科幻小说”。这样山清水秀的地方，给廖万清留下了幸福的童年时光；高高的山峰是廖万清孩童时代最喜欢的“游戏场所”。他上山采蘑菇、捉山鼠，或者干脆光着脚和小伙伴们一口气爬到最高的山峰，再俯瞰大地，感受“一览众山小”。直到现在，已是将军、院士



1952年在启文中学与班主任冯华欣老师



▲ 中学时代

► 2009年,与夫人回母校梅州中学



的廖万清也还是喜欢登高望远。

珍惜学习机会，立志从医、参军

由于很小就不在父母身边，廖万清很早就懂事了，从小就知道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所以倍加珍惜、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牢记启蒙老师的教导：“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日历、日历，挂在墙壁，天天撕去一页，使人心头着急，光阴如流水，转瞬无踪迹，想起我自己，年少少成绩”，廖万清给最后这句话又加上了“既往矣，来者可追！”以鼓励自己抓紧时间读书。这些话确实对廖万清起到了敦促的作用，他在学习上从没让叔叔操过心。提起启蒙老师，廖万清非常感激：“他不仅教导我认真读书，还教我如何克服障碍成功。小学五年级时我参加了一次演讲比赛，毕竟是小孩子，我心里很紧张，老师教我站在稻田上面，想象周围的稻田全是人，练习演讲，后来我得了小学演讲比赛第一名。”

土地改革开始，廖万清的叔叔被划分为地主，为了保护廖万清，叔叔和他分了家。从那以后，廖万清就开始独自过活，那时他只有12岁。廖万清上初中以后的生活几乎都是靠人民助学金度过的，“那个时候有人民助学金可以申请，经过老师、同学评选，结果我被选中可以拿助学金。开始是每月6块钱，我用1块8买菜，其他买米，所以我深深感受到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



初中毕业，高中升学考试前，由于吃了一块野山蜂的蜂蜜，廖万清病倒了。还好他的叔婆懂医学知识，是助产士，及时对廖万清施以救治，他才病愈并及时赶上了升学考试，考上了省重点高中梅州中学。廖万清的叔公廖罗士是留美学生，回国后当了乡村医生，并支持游击队，建国后被委任为梅县人民医院第一任院长。在廖万清看来，叔公的医术好、为人好，人人都爱戴他，廖万清对他更可以用“崇拜”来形容，所以廖万清从小就希望能像叔公那样当医生，解决人们的病痛之苦。此外，参军、报效祖国也是廖万清所一心向往的，因为他深知他是拿人民助学金长大的，是国家培养了他，而他要回报这一切。

1956年，廖万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恰逢军队院校到梅州中学招生。一开始是空军部队大学，廖万清的班主任推荐了他，但检查过后，廖万清因有海外关系被刷了下来；第二次是海军大学，但检查后，又因为廖万清体重达不到要求而再次落选（当时17岁的廖万清只有39公斤，但海军招生要求体重在45公斤以上）；第三次是第四军医大学前来招生，班主任又推荐了廖万清，在看了廖万清的简历并进行了相关检查后，招生负责人决定录取廖万清。有了两次落选经历的廖万清怀着忐忑的心问道：“我有海外关系，收不收？”招生负责人爽朗地回答道：“出身是没办法选择的，而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愿不愿意为国防卫生事业服务？”廖万清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愿不愿意到四医大？”“愿意！”“好，这就行。”廖万清又问：“我体重比较轻，身材比较瘦小，行不行？”招生人员答道：“不要紧，到了西安好好锻炼身体，会长大长高的。”一瞬间，廖万清参军、从医的愿望都实现了，他心花怒放，并暗下决心，要好好珍惜这难得的机会。

热血青年，一心报国

在跨越了十几个省后，廖万清来到了位于古城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廖万清从小长于气候湿润温暖的广东梅县，而他刚到西安时正是秋季，漫天的黄沙和刺骨的寒风是大西北给他的“见面礼”。除却适应环境，廖万清最先面临的“障碍”就是军训的超体能考验。17岁的廖万清个子不高且瘦，步枪和他差不多一般高，但不管教官怎么要求，廖万清都按要求训练，背着枪摸爬滚打、翻墙样样都照做





不误。尽管个子小，但廖万清硬是获得了部队嘉奖。在学习上，廖万清也不输人，一直稳居前列。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源于廖万清强烈的报国情：“我是祖国的儿子，是人民把我养大，我倾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辉煌历史，我也渴望接受军队严格的训练来磨练自己的意志，为神圣的国防医学及祖国的医学事业奉献一生。”

5年后，廖万清以“五好学员”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填志愿时，像当时的很多热血青年一样，廖万清怀揣满腔热情写道“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祖国需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去哪里”。当时军队已获得了大发展，出于建设的需要，一批优秀毕业生被分配到第二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和解放军总医院，成绩优秀的廖万清便被分到了位于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宣布分配结果的时候，同学们都很惊讶，因为廖万清只是一个农村小伙子，既无靠山又无后门，而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可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地方。谈起往事，廖万清坦荡地说道：“那时候我没有任何私人欲望，就是抱定组织需要我去哪儿就去哪儿，结果竟被分到了大上海进一步学习工作的大舞台，其高兴难以言表。”



开拓医学真菌学新领域

进入长征医院后，廖万清面临着人生又一个选择专业和科室选择。当时很多医学生都倾向于选择大内科、大外科，但廖万清却选择了并不“受宠”的皮肤科。“我认为那个时候皮肤科需要人。那时候皮肤病，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病人的问题，所以我选了皮肤科。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冷门有可能是将来的热门，现在的小科有可能是将来的大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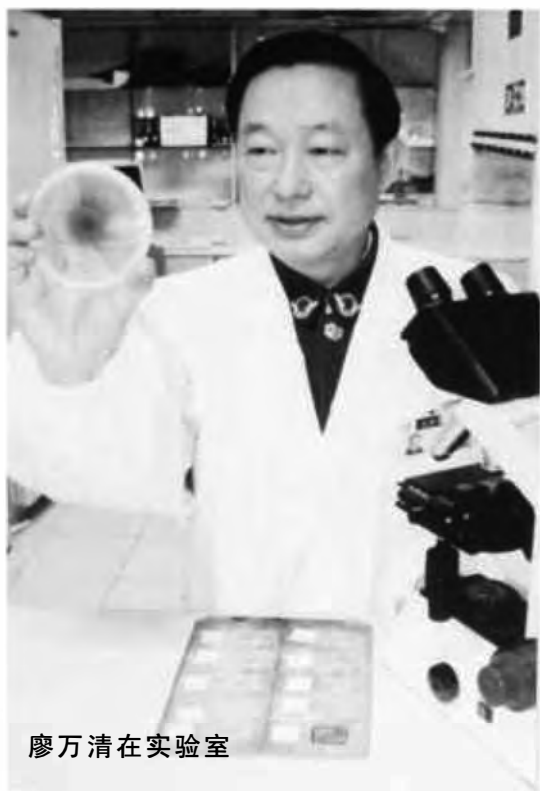
在皮肤科的工作过程中，廖万清发现真菌病人很多。20世纪70年代，廖万清参加了杨国亮教授牵头开展的上海市皮肤病调查，对上海11万人的调查显示，真菌病（如头癣、手癣、足癣、体癣等）的发病率是47.6%，大部分人都受真菌病困扰。在后来的工作中，廖万清又认识到，真菌不仅侵犯皮肤，还可以侵犯皮下组织、黏膜、胃肠、心肝脾肺肾、脑等深部组织，引起严重疾病，甚至引起死亡。“拿隐球菌脑膜炎来讲，如果不及时治疗，86%在1年内死亡，92%在2年内死

亡。”

正是与隐球菌脑膜炎的正面遭遇，才使得廖万清真正走进了真菌世界。1979年的一天，一名40岁左右从事海运工作的干部因高烧、昏迷到长征医院就诊，腰穿后发现，该患者系隐球菌性脑膜炎。廖万清参与了抢救，但由于病人就诊太晚、病情严重，又缺乏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法，几天后病人便不治身亡了。眼睁睁地看着一条年轻的生命逝去而束手无策，令廖万清非常难过，也备受刺激。这次事件后，廖万清开始钻研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治疗办法。为了了解“敌人”，廖万清骑着自行车去复旦大学微生物系当起了“走读生”，从基础理论、做实验到临床观察，他一步步越来越熟悉真菌家族。不久后，长征医院又收治了一名脑膜炎患者，这名患者是位27岁的司机，因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高烧、意识丧失被抬到长征医院。由于之前已在他院接受过抢救，但均不见效，家属已觉无望，并已为患者准备了后事。廖万清凭着临床经验和科研积累，果断确诊该患者为隐球菌性脑膜炎、隐球菌性败血症，且患者脑脊液菌体计数高达 $1040\text{个}/\text{mm}^3$ 。此时，廖万清打破常规，用最新的综合治疗方法鞘内注射及联合抗真菌药治疗、

降颅压及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实施救治，最终患者被成功抢救了回来，并返回了工作岗位，随访至今无任何后遗症。

此后，廖万清成功救治了一例隐球菌性脑膜炎患者的消息扩散开来，类似的病人纷纷前来找廖万清看病。1980年12月，在一例脑膜炎患者的腰穿脑脊液中，廖万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以往脑脊液中的隐球菌大多数都是他所熟知的圆形或椭圆形，而此例患者脑脊液中的菌体却呈现出奇异的细长型，就像是针形或棒形。这是什么东西？廖万清不懂。于是他开始请教其他专家，华山、瑞金、长海，各大医院他都请教了一个遍，结果竟没人认得这种奇怪的菌，甚至有权威人



廖万清在实验室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交流(前排左一)



士说这恐怕是污染菌，但这个回答却让廖万清心存疑问，“污染菌怎么会引起脑膜炎？”廖万清没有被权威所束缚，他不相信这样的回答，于是他继续做各种化验，并请南京皮炎所、复旦大学一起做，最后他们得出了一致结论这种菌是致病菌，是一个特殊的菌种。廖万清将这种菌的菌号定名为S8012S代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首次于1980年12月发现。近30年来，廖万清一直在用各种方法对此菌进行研究，现在已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等方法确定此菌为格特隐球菌ITS C型。目前，隐球菌S8012菌株已被美国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ATCC（ATCC 56992）、比利时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BCCM（IHEM 4164）、荷兰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CBS（CBS 7229）等国际著名实验室收录并永久保藏，并向世界各研究机构有偿供应该菌株，价格也从最初的184美元/株上升到了现在的250美元/株。廖万清表示，国内如果有谁需要这一菌种，他愿无偿赠送，“你在国外花250美金买到的菌种还是第二代的，我这里的是原创的，国外各实验室的菌种本来就是我最初送给他们的”，廖万清笑道。

除了隐球菌S8012菌株，廖万清还发现了多种新菌种：在我国首次发现了少根根霉引起的坏疽性脓皮病，该菌种被前世界人和动物真菌病学会秘书长Ch. De Vroey教授、著名真菌学专家M.A.A. Schipper等鉴定确认；首次发现“具多育现象米曲霉引起肺曲霉球”、“聚多曲霉引起阻塞性支气管曲霉病”、“涎沫念珠菌引起股癣型念珠菌病”、“顶孢头孢霉引起白毛结节病”等罕见真菌及其所致疾病并成功治愈。

这些新菌种的发现大多源于偶然。“偶然当中存在着必然性，偶然的出现依



发现的乐趣(2010年)

赖于平时仔细的工作。没有功底、没有知识基础，即便看到宝也不会认识”，廖万清如是说。由于科研成果突出，1985年经卫生部批准，廖万清在长征医院皮肤科成立了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隐球菌专业实验室”，为医学真菌学的发展和专业

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部队做真菌病防治工作是我的责任”

作为一名军人兼医生，廖万清十分重视军队真菌病的防治。“军队由于环境特殊所以容易发生真菌病。军队人多，资源相对少，尤其是海军，环境更特殊，用水需要控制，在训练出了一身汗后，往往衣服还要接着穿，这种潮湿温暖的环境很容易感染真菌。此外，由于整天穿着胶鞋，又要保持军人姿态，很长时间站着不动，这样就容易发生足癣。”廖万清通过对东海、南海舰艇部队、陆军野战部队、空军部队、特种兵部队、海军陆战队、驻岛部队万余人进行皮肤病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军队各种浅部真菌病的患病率为29.5%~60.3%，占非战斗减员的一半多。为此，他专门制定了针对军队真菌病的防治措施，并研制了防癣鞋垫、防

▲ 为海军官兵服务

► 为空军官兵服务





癣袜、防癣裤等抗菌装备及复方酮康唑霜、复方奈替芬霜等药物，显著降低了部队浅部真菌病的患病率，有效保障了战斗力。此外，针对粮食霉变引起战士的外源性变态反应性肺炎，廖万清及其团队还发明了专利食品防霉保鲜剂，防止粮食霉变。廖万清说：“作为一名军人，用我的研究成果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是我的责任。”

其相关研究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各类成果奖17项，并荣获解放军总部授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我的事业在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的1986年，廖万清曾请假去新加坡探亲。当时的新加坡已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环境优美、生活优越，他的母亲、姐姐、弟弟的生活已经很好，他们都劝廖万清留下来，并告诉他在新加坡行医待遇优厚，房子、车子、票子都不少。但却被廖万清婉言拒绝了：“我是系着红领巾、戴着共青团徽、穿着军装成长的，我热爱我的祖国，我的事业在中国。”廖万清对母亲说：

“如果您愿意，可以到中国来，如果您不习惯，总还有我姐姐、弟弟在新加坡照顾您，但我不会留在新加坡的。至于房子、车子、票子，我们以后也会有的，我觉得只要不愁吃、不愁穿，够用就行，不必要求太多。”

正是在廖万清去探亲的1986年，他还正在写一本书《真菌病学》。本来按规定探亲有3个月的时间，但为了事业和他的专著，廖万清不到3个月就提前回国了。1988年，他的第一部86万字的专著《真菌病学》完成。该书系统介绍了国内外真菌病学研究的现状及进展，介绍了我国科研工作者自己发现的新菌种、在我国出现的各种深部和浅部真菌病以及我国创造的防治真菌病的独特办法，是我国医学真菌领域一本重要专著，并获中国图书奖二等奖。



与卢世璧院士(左)一起获总后勤部“一代名师”称号



2010年9月，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接见。

寄语青年人

“我参军的时候不满十八岁，当我一满十八岁，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但由于我有海外关系一直没能如愿。但我一直都没放弃入党的愿望，仍然屡次申请，直到我45岁那年，我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再拿我当选教授来说，我足足花了25年才升为教授，当然有“文化大革命”的因素，但我想指出的是，中间无论历经什么，我都没有放弃上进心。如果此山望着那山高，或者中途放弃、改行，都不能实现我的理想，我也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因此，廖万清院士有句座右铭：“为理想，追求不断，矢志不渝；为事业，百折不挠，坚忍不拔。”他希望青年人能有这种执着理想、开拓事业的劲头。

廖院士还说：“院士就是战士，我还要继续向前辈、向同行学习，继续拼搏、继续战斗，为祖国、为军队做应有的贡献。”



总后勤部廖锡龙部长和廖万清院士(左一)亲切握手(右起为二军大曹国庆政委、长征医院郑兴东院长、总后卫生部张雁灵部长、长征医院张安祥政委)

开拓医学真菌学新领域

从王寿山走出的客家人

我是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20世纪30年代初，我的父母不甘忍受生活的贫困，像客家人的祖先一样，再一次踏上迁徙之路，漂洋过海到了印度尼西亚，惨淡经营一家小车衣店。1938年，当他们又漂泊到新加坡时，我出生了。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东南亚。为了留根于祖国，饱受战乱之苦的父母，就把上有姐下有弟的我送回了国内，交托我的叔叔。也就在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那年我才3岁，从此就跟着叔叔生活。

叔叔不负重托，加上客家人又有“崇文重教”的传统，到了读书的年龄他就供我上小学。叔叔和我住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四周青山的主峰上有着棋盘石、笠麻栋等王寿山十八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蜿蜒流过廖家祠堂和我上学的明新小学堂。廖家祖上说，这里风水极佳，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兴许是应了祖上的预言，我生逢其时地日后有机会成了一名医生，又当上了将军和院士。

应该说，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学习上还是很艰苦的，但也很努力，这也许是没有得到父母的宠爱，较早成熟的缘故吧。那年头，我做完作业，就上山去采蘑菇、捉山鼠。山鼠肉又鲜又嫩，还滋补身子。几十年过去了，至今回想起儿时的美味，依然唇齿留香。

由于从小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的初中和高中都是靠人民助学金读完的。高中毕业了，我被保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我心驰神往的神圣殿堂。由于家父患肺结核早早地离开人世，而我的叔公又是梅县人民医院的院长，这些都是促成我立志从医以治病救人的理由和动力。

离开了山清水秀的梅县，我从祖国南部的广东，一下子跨越了十几个省来到了六朝古都西安，成为第四军医大学的一名学员，这其中的艰辛，怎是一个“难”字了得？记得刚入大学那年，我的体重才39公斤，从青山秀水的广东来到黄沙弥漫、朔风刺骨的大西北，以不足80斤的羸弱之躯去面对严格的军事训练。环境的巨大反差和超体能的考验，成了我跨入医生行业的第一张试卷。但是，客家人毕竟都是硬汉子。再说，我还怀揣一股强烈的报国情。我是祖国的儿子，是人民把我养大，我倾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辉煌历史，我也渴望接受军队严格的训练来磨练自己的意志，为神圣的国防医学及祖国的医学事业奉献一生。正是这种朴素的信念，鞭策着我的求学生涯，也陪伴着我的医学人生。

1961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1个月，我又风尘仆仆地来到长江之滨





的大上海，成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的一名军医。

“三大战役”

今天，尽管我已成了一名文职将军，但我的职业依然是医生。我希望周围的同事、朋友依然叫我“廖大夫”或者“廖医生”。医生毕竟是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

回顾从医四十八年，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但也曾在科研和临床上兢兢业业地做了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军队里的将军应该是率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而我的将军职位只是在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在救死扶伤的工作中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若要套用军事术语，那么我这一生也曾率领我的科研团队打赢过“三大战役”吧！这三大战役便是：创建实验室，发现新菌种，编写《真菌病学》。

创建实验室

我在皮肤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搞医学真菌研究。对业外人士来讲“真菌”这个名词是很陌生的，常人只知道患了痛痒难捱的脚气病，是真菌在作祟，别的就说不上了。其实，真菌是微生物中的一个大类，在自然界有150多万种。其中大多数是直接或间接对人类有益，大约有300多种会引起人类不同的疾病，或引起严重的感染，如不及时诊治，甚至会夺去病人宝贵的生命。“文革”十年浩劫期间，真菌病学研究被迫停止，保藏在实验室里的病原真菌也全部被破坏致死。十几年科研成果得到的无数宝贵资料被毁之殆尽，这对国家、对民族、对真菌病学研究都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1978年，由我主持的真菌实验室，就是在这荒漠似的烂摊子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的。那时候，实验室很小，办公条件很简陋，有时只能



参加学术会议与马来西亚专家一起



与瑞典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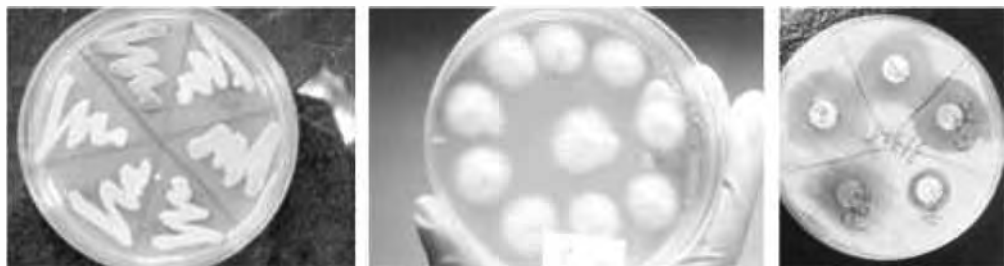


在家里整理材料。那时家里条件也不好，写东西没有书桌，就坐在小凳子上把床当桌面，或者干脆就趴在床上写，这种习惯甚至延续至今。然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前沿探索，不论是基本的形态学、生理生化学研究，还是进一步的血清学、免疫诊断，甚至分子生物学方面的探索，都在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展开。就是这间小而简陋的实验室成了当时全国仅有的五个真菌实验室之一。由于科研成果突出，我们的实验室在1985年被卫生部批准成为国内唯一的“隐球菌专业实验室”。

这场“战役”所取得的辉煌战绩是实验室扩大了，人才培养出来了，一大批研究生成了真菌研究的栋梁之材，医学真菌研究后继有人了，一项项振奋人心的科研成果也呼之欲出，影响海内外。我有幸受邀先后到了美国、比利时、日本、意大利、德国、印尼、澳大利亚、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交流讲学。我们团队的科研成果为减轻病人的痛苦、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起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发现新菌种

1980年12月，我首次发现新生隐球菌变种S8012（格特种ITSC型）引起脑膜炎；1985年至1987年，先后发现了光滑念珠菌引起膀胱炎，束状刺盘孢霉引起角膜炎，构巢裸壳孢菌与黄曲霉引起肺部感染，具有多育现象的米曲霉引起肺曲霉球；1989年至1990年，我们的科研团队又进行了ELISA诊断隐球菌性脑膜炎及中国致病性新生隐球菌血清型的研究，还进行了一株多形态新生隐球菌的研究和真菌败血症的研究；1994年我又投入对顶孢头孢霉引起白毛结节病的研究；1995年至1997年，又对少根根霉、多育曲霉、茄病镰刀菌的致病性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2004年又发现聚多曲霉引起的肺部感染，并成功治愈……从“战役”的角度来讲，发现新菌种，就等于发现了劲敌、顽敌。治愈其引起的疾病，就等于战役全线告捷。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是医学研究上攀高峰的难事。但我们凭着常年积淀的知识和素养，凭着为理想追求不断，矢志不渝，为事业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也是我的座右铭），硬是废寝忘食地在实验室不断探索，在临床上不断积累，不断发现了新的病原真菌，解决了不少医学真菌的疑难





杂症的诊治问题。开拓了医学真菌学的新领域，推动着医学真菌学的发展。我所发现的隐球菌S8012菌株已被美国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ATCC（ATCC 56992）、比利时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BCCM（IHEM 4164）、荷兰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CBS（CBS 7229）等著名实验室收录并永久保藏，这些实验室有偿向世界各研究机构供应菌株（美国ATCC售价已增值为250美元/株）。1989年，我们的“我国首见四种真菌的致病性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1987年，我们的“具多育现象米曲霉引起肺曲霉球的真菌学鉴定”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6年“系统性真菌感染的实验诊断与临床研究”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1年，“真菌病的基础与临床系列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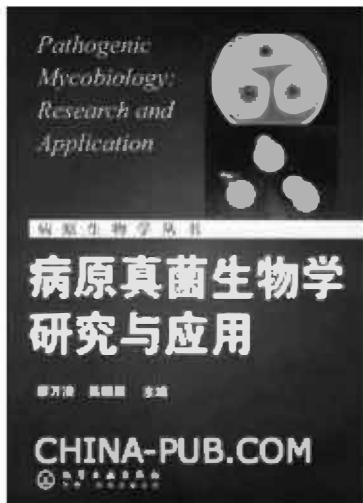
至今还清晰可见的场景，那是一个阴冷的冬天，一位姓井的27岁的男性司机被抬进了上海长征医院。患者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体温40摄氏度以上，意识丧失……在这之前的抢救均不见效，家属感到深深的痛苦和无望。我凭着临床经验和科研积累，从他的症状和化验结果，果断地确诊他为隐球菌性脑膜炎、隐球菌性败血症。我毅然打破常规治疗，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实施救治。

当恍如隔世的井司机手捧着鲜花和锦旗来感谢我们的时候，他哪里知道，当时他身体内使他致病的隐球菌的数量之多，足以让他死多次。

编写《真菌病学》

几十年挑灯夜读，几十年废寝忘食，几十年心神贯注的临床实践，几十年殚精竭虑的科研探索……我的《真菌病学》专著总算在专业人员的翘首企盼中问世了。我的本意是尽一份真菌科研探索者的绵薄之力，尽可能系统地介绍国内外真菌病学研究的现状及其进展，特别是介绍我国科研工作者自己发现的新菌种、在我国出现的各种深部和浅部真菌病，以及我国创造的防治真菌病的独特办法。作为高校的高级参考书，我相信对医学院校的学生和相关的真菌科研工作者应该会有些帮助的。

1998年《真菌病学》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2002年，我还有幸荣获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2008年“重要深部真菌病发病机理及临床诊治”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同年，获得总后勤部“一代名师”称号。



培育新人

面对荣誉，我很清醒，我是祖国、是党培养的，一切荣誉应该属于党、属于人民。院士就是战士，我要继续拼搏，继续战斗，用我的一生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年过七旬，我考虑最多的是让我国真菌研究后继有人的问题。在坚持临床科研第一线的工作外，我主动挑起医学新人培养的重担。至今，已先后培养了20名博士生、28名硕士生和4名留学生；我和我的同事们还先后主办了10期全国医学真菌学习班，1期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国际学习班；自2005年起，我还开办了“好医生网”的网上讲座，点击次数已近4万次。



研究生毕业庆典

现在，我正带领课题组开展有关隐球菌、念珠菌、曲霉等重要病原真菌引起疾病的致病机制及其防治的研究，以期破解相关致病机理，继续提高诊断及治愈率。

无论前方的路有多长，有多远、有多艰难，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无怨无悔。我心中很明白，我是一名新加坡归侨，我的根在祖国，我是祖国、是党、是军队培养的，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医学卫生事业！

（本文根据方鸿辉采访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廖万清将军的文稿整理）



感谢恩师冯华熏



院士全家福